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张颀

如果在历史的进程中,额外发生了一件小事,是否会产生“蝴蝶效应”那样的巨大逆转?

或许这种穿越历史的想法在你我脑中都会偶有闪现,“文学鬼才”马伯庸却用上了历史学者那样的研究劲头,把这个“如果”当成了正事。从自成IP、书剧都广受好评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,到最近预售一小时销售额即破千万的新书《两京十五日》,都是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缝隙、不足为奇的隐秘角落开始,贯穿一系列真实的历史节点,直到不断反转的结局为止。

长达68万字的小说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来自于知乎上的一个问答——“如果你来给游戏《刺客信条》写剧情,你会把背景设定在哪里?”马伯庸的回答在不经意间创造了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里的一段故事:从狼卫入长安,到望楼登场,侍女持杖在沙盘上改变狼卫的位置。后来这成了小说的开场,又演化为电视剧中被精准还原的大唐气象。

《两京十五日》也是来自这样的历史缝隙——阅读《明史》时,马伯庸注意到了其中一段关于宣德皇帝的记载:“夏四月,以南京地震,命往居守。五月庚辰,仁宗不豫,玺书召还。六月辛丑,还至良乡,受遗诏,入宫发表。庚戌,即皇帝位。”



## 马伯庸:『野生历史学者』的穿越写作

这段记载看似平平无奇,其中却隐藏着极大的戏剧张力:皇帝突然在京城病故,太子却远在外地,他这一路怎么匆忙赶回去,心情如何,有谁陪同,又遇到了哪些困难与危险,这些空白于史书的细节,让人浮想联翩。于是,这总共40个字的历史记录由马伯庸衍生出来了上下两册共70万字的历史小说。

在真实的历史架构和细节中,脑洞大开地铺陈出一个个悬念和反转,“文学鬼才”马伯庸的这种写作风格被网友称为“考据型悬疑文学”。这种作品类型无疑需要作者兼具历史研究学养和网文写作经验,马伯庸恰好是一个从网络写手起家的“野生历史学者”。

马伯庸是笔名,本名马力的他1980年生于赤峰,满族人。因为有段时间与他有接触的人常会遇到“霉运”,他却毫发无伤,故被称为“祥瑞御兔”或“祥瑞亲王”,也有了“马亲王”这个网络昵称。

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商学院读书时,马伯庸第一次接触到了网络。当时在网吧上网要20元一小时,作为一个穷学生,他只能攒下一周的早饭钱,周末跑去上一个小时网。因为贵,不舍得在网上浏览,他就带一个3.5英寸软盘,一小时内找很多小说,拷下来,再到学校一块钱一小时的单机机房,把它们全都读完。

有一次软盘坏了,拷贝的小说只显示了前半部分,马伯庸不小心碰到键盘,打了几个字,没想到正好和小说后面的那句话接上了。他心想:“原来我也能写啊!”于是又试着敲了几句话。每周之后发到网络论坛上,反响不错。于是他每周都到机房写东西,周末发到网上,下个星期再去回帖,就这样入了网文写作的坑。

后来马伯庸去新西兰留学,“因为那个地方特别无聊,每天下午6点以后所有店都关门了,留在屋里不是看书就是玩游戏、写东西。”当地图书馆里不多的中文书籍中有陈寿的

《三国志》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读这两本书而生发的历史探讨,是马伯庸网络写作的一个基石。在他看来,那个时代是有文字以来,创作者和读者之间最透明的阶段。大家彼此之间坦诚相待,写作是为了兴趣,有人过来点个赞、评论几句,就是最高奖赏了。

从1999年在只有20多人的小论坛写起,后来到更大的论坛被更多人熟知,再到出书,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,马伯庸的写作从没间断。哪怕从新西兰留学回国后,他在施耐德电气这家外企工作了10年,直到2015年才辞职成为一名专职作家。

职场经历让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里不乏现代性,比如在构思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时,“我写的张小敬,他遇到的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:我的一心想做一件事情,但是周围一圈傻子拖着,我干不下去;李泌的问题也是,我一个985毕业的大学生,天之骄子,结果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。我以为凭我的才能就能解决,却发现不是这么回事,社会很复杂。”

去年电视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大火时,马伯庸供职过的施耐德还买了两千多本书,请马伯庸回去签名。马伯庸欣然赴约,并在微博上写了段子:“看着市场、财务、人事、法律和各事业部的前同事和前领导过来求签名,百感交集。十年之前,都是我拿着投标文件去找各个部门苦苦求签名……”

现在回忆起自己的写作之路,马伯庸依然能想到创作某部作品时的工作环境:我在重庆当销售时,不去解放碑打望美女,却傻乎乎地趴在办公室里写《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》;写《笔冢随录》时,我正在亦庄的工厂里枯坐,身边是乏味无比的技术手册,远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线;公司搬到望京之后,我得到过一个隐藏位置绝佳的工位,猫在那里敲完了《破案:孔雀东南飞》和《风雨(洛神赋)》……

这部工作之余写就的《风雨(洛神赋)》在2010年与贾平凹的《一块土地》共同摘得人民文学奖散文奖。2012年,凭借《宛城惊变》和《破案:孔雀东南飞》,马伯庸又获得朱自清散文奖。虽然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可,但他不认为作家有专业和业余之分,自己也没有那种“正经作家要写正经东西”的使命感。马伯庸说自己一直属于“野生生长”的状态,想到什么就去写什么,哪怕是一个梦。

2013年,马伯庸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在月色笼罩的草原上开一辆解放卡车,旁边坐着一个传教士,絮絮叨叨说着拉丁文,动物们排成一列长队,跟在车后面,缓缓前行。这个梦太过奇妙,马伯庸一直念念不忘,就写成一个短篇,刊登在《人民文学》2016年6月号上。后来,他无意间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晚清时期的地方志《绥远志略》,讲一个传教士用电影机向草原的牧民们传教,“最先进的电影科技与最古老闭塞的草原,新旧交错、东西方的冲撞感非常强”,马伯庸决心将这个故事的扩充为长篇,于是就有了《草原动物园》这部小说。

他将故事安排在自己的家乡——汉蒙交界、信仰庞杂的赤峰,庚子事变,外国来华的传教士……为了在虚构的故事中突显历史细节的真实,让整部小说力量浑厚,马伯庸特地回了趟老家,搜罗那里的传统民间故事,找来关于清末的文献和论文,大到赤峰城的格局、官府的职位,小到当时报纸的名称,都一一敲定,毫不含糊。

这种研究劲头也为马伯庸增添了一些学者气质,在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的同时,碰到什么他就会研究什么。偶然与朋友聊起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桩民间税案骚乱,其过程跌宕起伏,妙趣横生,马伯庸忍不住要把它写出来。当他开始搜集资料,越看越是兴奋不已,从明代的民间档案文书里,挖掘出了六个尘封已久的故事,2019年出版了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这部非虚构历史纪实作品。

写作这样的题材需要历史真功夫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作为商学院出身的海归前外企员工,马伯庸在研读这些资料时,发现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,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。

比如说,明代采用两京制,南京同样设有六部,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。在丝绸案初稿里,有一位户部尚书,他下意识地认为是北京户部。后来他人指出,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,颇有实权。再后来,经过专业学者的提醒,他再去查证,才确认了正是北京户部尚书。谈及《两京十五日》的写作初衷时,马伯庸也打趣说这是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的副产品。因为当时买了很多明朝的资料,只写一本书也太亏了。

曾有评论说,历史题材的小说写作中,想象与真实的界线究竟何在。马伯庸赞成大仲马的说法:“历史只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,用来挂我写小说的大衣。”他的历史小说写作一直保持两个原则:第一,真实的历史事件不能变;第二,真实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追求不能变,“这两个点定住了,中间可以尽情想象。写小说就像是一个借口,满足的是我想象的好奇。”

□杨朝明

如果大家来到国家博物馆看孔子文化展,首先就会看到一支骨笛,它是用丹顶鹤骨头做的。这个笛子的考古发现年代,会让我们感到吃惊。因为孔子距离今天大约是2500年,这个笛子出自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,距今约8000年。对骨笛的测音结果表明,在8000年前不仅有了完整的七声音阶,而且音孔的高精度让人感觉不可思议。这一发现不是孤立的,在几次发掘中,前后出土了骨笛30多支,简直可以装备一支小乐队了。从时间上讲,孔子距离我们有2500年,在孔子生活时代之前的五六千年,中华文明会是怎样一种形态?

骨笛的例子是要说明,在孔子时代以前,中华文明实际上已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孕育的历程,我们说孔子好学,好学得先有所可学。孔子所处的鲁国,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,这个区域与时空,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?

孔子从小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,父亲很早就去世了,孔子在母亲的教导下成长。孔子自幼好学,《论语》里面就记载:“子入大庙,每事问。”到了鲁国的大庙以后,孔子见到不了解的情况就提问。有人就说,这个孩子是不是不懂礼,怎么什么都问。孔子回答说,不懂就问,这便是礼。

孔子到了50岁以后,终于有了从政的机会,做了鲁国的中都宰,也就是中都的地方官。中都大约是鲁国除了国都之外的第二大城邑。典籍里面记载说,孔子在中都“制为养生送死之节,长幼异食,强弱异任,男女别涂,路无拾遗,器不雕伪”,如此这般“行之一年,而西方诸侯则焉”,就是说如此施政了一年,西方的诸侯都来学习取法。大家知道鲁国在东方,“西方诸侯”其实就是天下诸侯。《史记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写的不是西方而是四方,“行之一年,四方诸侯皆则之”,干脆说各地诸侯都来向孔子学习。鲁国国君看到孔子治理中都成效如此显著,就问他,以你的办法治理整个鲁国可行吗?孔子很自信,答曰:“虽天下可乎,何但鲁国而已哉。”他说用来治理整个天下都可以,别说仅仅是一个鲁国了。这透露出来孔子思想的一种“放大”,孔子虽是治理中都,但可以放大到鲁国,可以放大到整个天下。孔子思考的实际上是由民生而人生的问题,只要抓住根本,治理一个小的区域可以,当然治理整个鲁国、整个天下也都可以,这是一个空间的放大。

我们再看一个时间的绵延。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说,老师,再过十代,人与人相处的法则还能够知道吗?孔子回答说: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可知也。”也就是说,孔子认为人与人相处有一种礼的规定性,夏商周三代都是基于礼义,只是各个时代礼仪的形式一定是各有损益的。也就是说时代发生了变化,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、管理的方式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,但这种变化就是损和益,损就是把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去掉一些,益则是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增加一些,但深层的东西不会变,“虽百世,可知也”。在这里,孔子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时间的绵延连续。我们之前讲中都、鲁国、天下,这是空间的放大,孔子说的三代、十世、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。

不管是时间的绵延还是空间的放大,孔子最为关注的还是能够超越暂时与区域性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。中国几千年来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礼的问题,也就是明理的问题。《尚书》里面就谈到了人心和道心,我们作为一个自然的人都有自己的自然诉求,这就是我们的人心,但人心深不可测,人心惟危。作为一个自然的人,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自然诉求,但同时作为一个社会的人,我们必须遵守社会的规则,这就是一个道心问题,道心确实又很精微。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在想怎么做和应当怎么做之间两者如何处理,我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怎么办?孔子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,这个“一”,它的内涵非常复杂,实际上就是一体的思维。只有能够在社会关系的两端换位思考,不要偏于一方,不偏不倚才能允执厥中,把握住这个“中”。

孔子的弟子子张问孔子,请您告诉我一个根本性的行为原则,让我走到哪里都能通达。孔子就告诉他六个字:“言忠信,行笃敬”,说话的时候要忠信,做事的时候要笃敬,如果能做到的话,“虽蛮貊之邦,行矣。”这样到哪里都一样行得通,如果言不忠信,行不笃敬,“虽州里,行乎哉”,如果做不到这一点,即使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,也行不通。孔子告诉他:“立则见其参于前也,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,夫然后行。”什么意思呢?把这六个字牢记在心,就好像时时在眼前都能看到这六个字。孔子思考的从来不是一时一地,他思考的是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法则。即使离开我们熟悉的环境、熟悉的文化,到了其他任何一个地方,也应该这样做。从时空维度上来看,孔子思想的超越意义就凸显出来了。

同样,子贡还问孔子一句话,说: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?”孔子答曰:“其‘恕’乎!”他说大概就是“恕”吧,什么叫恕?孔子接着解释说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这就是忠恕之道,忠就是修己,恕就是推己。所以孔子说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

孔子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,就是因为他思考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具有广阔的时空维度。

(本文整理自作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演讲)

【文化观】

## 时空维度下的孔子与儒学